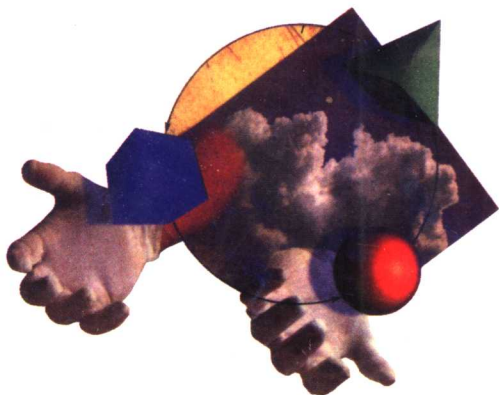


a o y u m i n g j i a c o n g s h u

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

◎ 顾问 柳斌 主编 邹贤敏



洪镇涛：

DAKAI XUEXI YUYAN DE DAMEN

打开『学习语言』的大门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Zhongxueyuwensuzhijiaoyumingjiacongshu

洪镇涛： 『打开学习语言』的大门

DAKAI XUEXI YUYAN DE DAMEN

◎ 顾问 柳斌 主编 邹贤敏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镇涛:打开“学习语言”的大门/董明旺主编.——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0

(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/邹贤敏主编)

ISBN 7-5351-2755-X

I. 洪… II. 董… III. 语文课—教学改革—中小学
IV. G633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0079 号

出 版：湖北教育出版社
发 行

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
邮编：430015 电话：83625580

经 销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通山县印刷厂 (437600·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)
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 5 插页 7 印张

版 次：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：187 千字 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—5351—2755—X/G·2239

定价：11.0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，承印厂为你调换

优化语文教学过程
革新授受传习模式

一九九九年四月 柳斌





走自己的路

洪镇涛 九九年
五月

丛书主编手记

生命之春

在“八大家”中，我与镇涛最熟悉，相知最深，但这篇手记却写在最后，因为太近了，有时反倒感到无从下笔。文学与审美中的“距离”说确有一定道理，看人看事亦然。

1982年春，湖北省政府在报上公布了第二批特级教师名单，镇涛榜上领衔，而且是语文学科中最年轻的一个。那是科学的春天，也是他生命的春天。他早在1978年就倡导语文教改，其公开课被叶苍岑先生誉为“体现了语文教改的方向”；80年代初他即提出“变讲堂为学堂”的系统主张，形成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

“八字教学法”，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广泛关注。但确立他在当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的，主要是他在90年代初提出、90年代中后期不断丰富完善的关于“学习语言”的理论与实践。这10年可说是他的“第二次创业”，他生命的第二个春天。

从70年代末开始的语文教改，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，一大批教改名家都是在这个时期创造了各自的辉煌。90年代初，教改呈相对沉寂的局面，如何深化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。这时，能够对新时期语文教改，特别是对自身的教改经验进行深刻反思的改革者为数不多，而洪镇涛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。他的《“学习语言”还是“研究语言”——浅论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误区》在《中学语文》发表并展开讨论时，就颇有登高一呼的味道。如果说80年代的语文教改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、教学过程和教材体系

的革新等层面，那么“学习语言”论则把语文教改的重心自觉地直接推向本体层面，基本形成了本体论的语文教学新体系的框架。这是在80年代教改成果基础上的必然发展，是他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艺术一次质的提升，也为语文教改的深化，为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。我并不认为镇涛所倡导的是解决语文教学“老大难”的惟一途径，但它的确抓住了最本原、最本质的东西，并在操作层面上有一套简便易行的方法，效果明显。可能会有人对“本体改革”的提法持异议，但这不影响“学习语言”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。当然，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，“学习语言”论也必须在实践中发展。我以为，镇涛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语言学的层面，如何批判吸取现代语言学的精华，使“学习语言”论富有现代内涵，更符合语言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，更有利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小学生学习 and 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无论观念还是方法，一定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，仅仅回到传统是行不通的。在这方面，所有投身语文教改的人们都还有许多工作可做。

近几年来，镇涛又开始了新的征程——按他的“学习语言”语文教学体系主编“三主一副”四线平行推进结构的开明版中小学语文实验课本，向现行教材和应试教育挑战。我无法预言他这最后一搏是否会成功，或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，但这种不断进取、永不言止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。在我的眼里，他是一名不倦的战士。他身体瘦弱，疾病缠身，但只要一谈起教改，只要一走上讲台，他就精神抖擞，两眼放光，倾倒听众，从无闪失；只有教改和讲台才能燃旺他的生命之火，也只有在这里，他才找到自己生命的春天。

邹贤敏

1999年6月30日

目录

丛书主编手记

- 生命之春 / 1

教改春秋

- 鸿爪雪泥 / 1

夫子自道

- 我的语文教学体系 / 12

答客问难

- 对当前语文教改问题的思考 / 45

论著自选

- 教学上不宜提倡“大运动量” / 49
- 文言文教学中要重视诵读 / 50
- 语感的类别及其训练 / 58
- 语感分析的特点及技法初探 / 77
- 试论语文教学观念中的若干误区 / 83
- 《祝福》语言艺术撷英 / 87
- 课文语言品味示例 / 91

课例评点

- 《天上的街市》课堂教学实录 / 108
- 读《〈天上的街市〉课堂教学实录》三题 / 119
- 《伶官传序》课堂教学实录 / 121
- 一日为师 终身受益 / 134
——安阳市一中94（三）班学生听课感想
- 参与·实践·学习语言 / 137
——评《〈伶官传序〉课堂教学实录》

教学镜头

- 披情析理巧设喻/140
- 捶桌子/141
- “大家都是鲁迅”/143
- “拈”的魅力/145
- 词语教学运匠心/146
- 精彩的尾声/148

评论荟萃

- 洪镇涛“学习语言”论讨论述评/150
- 感受·领悟·积累·运用/163
——洪镇涛课堂教学艺术管窥
- 阅读教学离不开“分析”/167
- 回归本体 走出困境/171
——谈深化语文教学改革
- 谈洪镇涛先生的治学品格和他的语文教学思想的实质/178
- 研究 宣传 推动/184
——在“洪镇涛语文教学思想及教学艺术研讨会”上的总结发言
- “学习语言”语文教学第一轮实验结题报告（节选）/188
- 老洪的课，“新”在哪里？/192

弟子说师

- 成长的日子/197
- 他，不停地求索/201

附录

- 洪镇涛论著索引/205

教改春秋

鸿爪雪泥

—

中师毕业后，我当上了小学语文教师，之后考上大学，之后又当上了中学语文教师。我发现，我的学生对我的教学不感兴趣。每当看到学生在课堂上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，那种恹恹欲睡的神态，我就联想起我当学生时的情景。是的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但我又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我苦恼极了，我恨自己无能，更后悔当上了语文教师。但这是无济于事的，我只能从教学上想办法。终于，我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两个办法：一个是“添油加醋”，即讲课中穿插点笑料，语言中增加点风趣；另一个是“节外生枝”，比如教《孔乙己》时，由孔乙己考不上秀才联系到范进中举，由范进中举又讲到有关科举制度的一些常识，等等。采用了这两个办法，果然有效，学生比较爱听了，甚至还称赞我讲得好呢！我开始高兴起来。但高兴之余，心里仍不踏实。学生究竟得到了多少？语文课就应该这么教么？我仍然怀疑着。

二

“文革”前，我在语文教学中做过某些改革的尝试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缺乏系统思考，构不成体系。“文革”的祸水冲

毁了整个教育大厦，也冲垮了旧的语文教学体系。我在痛心于教育被摧残的同时，竟幻想在“平地”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语文教学体系。1973年，我经过认真思考，写出《关于改革中学语文教学的初步设想》，提出“多读多写，读写结合，加强实践，提倡自学”的主张，正而八经地递交给了当时占领着上层建筑的“工宣队”。这自然使我碰了一鼻子灰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也迎来了语文教改的春天。我找出了那份被“枪毙”了的《设想》的底稿，又经过反复琢磨，抹去了某些“文革”痕迹，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，重新写成《关于中学语文课教学改革的建议》，指出语文教学长期处于“少、慢、差、费”的局面，主张“多读多写，读写结合，重点精讲，加强自学”，建议“教材按单元组成”，以文体分类，“每册编10~12个单元（语文基础知识在外），每个单元编4~6篇文章。每单元中只有一篇是作为教师精讲的范文，要求有较强的典范性；其他几篇作为学生自学的材料，要求选取适合学生阅读能力和对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有帮助的文章。每单元前面，加写单元教学目的和对学生的阅读、写作要求”。“语文基础知识，按照少而精和实用的原则，编成独立系统的教材”。教法上“按单元组织教学活动，每单元教学之始，向学生讲明本单元的教学目的和要求。范文要讲得深透，但不要面面俱到。学生自学课文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，要布置作业和组织课堂讨论。”“要指导学生自学方法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。”“每学期写10~12篇作文，作文题既要结合阅读课的要求，也要尽量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。”“作文不要求教师普遍评改，而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互相交流，互相评阅，教师抽查，典型评讲。”“进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，可适当结合学生的写作情况。”这篇文章不长，但算得上是一个有关教材、教法全方位改革的雏形方案。

1978年7月，《湖北教育》全文发表了 my 《建议》，我深受鼓舞，随即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下，搞起了语文教改实验。我们自编补充教材，改进教法，搞得热火朝天。

当时，教育界学习福建经验，掀起一股“大运动量”训练热

潮。我认识到这种做法潜藏着摧残人才、贻误教改的危机，于是我写了一篇《在教学上不宜提倡大运动量》的文章，并在1979年3月29日的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。文章指出：“‘大运动量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（至少是有片面性的），在实践上是有害的。”同时我又指出“不赞成‘大运动量’，是否就是主张让学生少学点，少练点呢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们主张尽量让学生多学一点，多练一点。但这是有条件的。首先，要限制在学生接受水平的范围之内；其次，最主要的是指在单位时间内（主要是课堂内）让学生多学一点，多练一点，多得到一点‘实惠’的东西。课外可布置适量的必要的作业，但决不是越多越好，决不要过多地占用学生课外的时间。又要多学多练，又要不占用很多时间，这不是矛盾的么？不，这里存在着一个提高教学效率的问题。时间，看起来是一个不变的常数，但如果在改进教学方法上下了功夫，也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。”最后指出，“向教学方法讨时间，向教学方法求效率，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，而在这方面又是大有可为的。”我原来提出的“多读多写”，本意也是通过教改来实现的，并非主张“大运动量”，但“多读多写”容易被误解为“大运动量”，于是我逐渐放弃“多读多写”的提法。我把教改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上来。

我的第一轮教改实验，在我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的1978~1980届高中班进行。这个班的学生虽然是择优进校的，但多数人数理成绩好而语文成绩差，全班中考语文人均成绩只有50多分，41%的人不及格。语文教改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，通过两年的学习，学生的读写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显著提高，高考语文人均72.2分（百分制），在省内名列前茅。还有一名学学生语文得90分，为全省最高分。语文教改不仅没有损害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他学科教学，其他学科的高考成绩都很好。全班47人，有40人考取了省级以上的重点大学，创造了我校班级升学率最高记录。

1980年10月，武汉市召开“语文课堂教学研讨会”，这是新时期武汉市举办的第一个大型语文学术活动。特请首都著名语文

教育专家张志公、叶苍岑、张寿康、章熊等莅临大会，山西、广西、江西的一批语文教育工作者也闻讯主动赴会。武汉市与会代表近300人。会议安排我大会发言并上公开课。我知道，这是对我两年来语文教改的一次全面检查，面对专家和同行，我认真汇报了两年来“改进语文教学的一些体会”。接着，我又在武汉教育学院闭路电视系统上上了公开课《药》。我20年前的老师、北师大老教授叶苍岑先生听课以后，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勉励说：

“课上得好，不是一般的好，而是体现了语文教改的方向。语文课就是要这样上。”张寿康先生（当时兼任《中学语文教学》主编）嘱我为他的杂志整理一个讲课“实录”，并写一篇文章。此后我陆续写了《让学生学多点，学好点》，《改进中学语文教材的初步尝试》，《教师立足于导，提高自学能力》，《以自学为主》，

《有话可说，有法可效》，《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自学》，《在诗歌教学中要重视朗读》等文章，涉及的面较广，但重点还是强调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。具体提出了“四导”，即用讲来导，用问来导，用读来导，用练来导。试图解决好教与学这对矛盾。

1981年12月，《语文教学通讯》把我作为“封面人物”，除发表冯一先生写的《洪镇涛和他的八字教学法》和我的《药》的教学实录外，还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《教师的责任是“教”学生

“学”》。我在文章中说，“学生的学习过程，是一种求知增能的过程。教师的教学，就是要解决学生从不知（少知）到知（或多知），从不能（或少能）到能（或多能）的矛盾”，在学习过程中，“学生的‘学’是内因，而教师的‘教’终究是一种外部条件，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。教师的主导作用，只有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前提下，才能发挥出来。”因此“要提倡学生自学，采取以自学为主的方法”，“教师的责任就是‘教’学生‘学’。”

三

1982年2月，我意外地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特级教师。我意识到，从此身上的压力更大了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于是，我一方面坚持教学实践，一方面提高理论修养，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。

我认识到，为了落实“‘教’学生‘学’”，必须改革课堂教学结构，建立一套新的课堂教学模式。我先后发表了《引导自学，培养能力，发展智力》、《改革课堂教学结构的尝试》、《建立以自学为主的课堂教学结构》等文章，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“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学为主要方式，以读写听说活动为基本内容，以思维训练为中心”的五环节结构模式。后来觉得“以思维训练为中心”的提法欠妥，修正为“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中心”。1982年11月，湖北省中语会在宜昌召开全省语文启发式教学专题研讨会，让我出一个演示课。我上了《最后一次讲演》，在教学结构上体现了我的新模式，引起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。这个课的成功，坚定了我改革课堂教学结构的信心。

改革了课堂教学结构，在课堂组织形式上为“‘教’学生‘学’”提供了保证，同时还要进一步解决好教师“讲”的问题和学生“学”的问题。1983年10月，湖北省中语会在武汉市召开“如何指导学生学”的专题研讨会。会上，我出了一个演示课，即教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，还提交了一篇题为《谈谈我是怎样指导学生学习的》论文。文章总结了我在教学上实行的“三变”，即变“全盘授予”为“拈精摘要”，变“滔滔讲说”为“以讲导学”，变“默默聆听”为“研讨求索”。这“三变”，是想解决如何处理教材，如何运用讲解和如何组织学生学习等问题。

至此，从教学思想到教学结构，再到教学方法，形成了一个系统，从理论和实践上比较全面地探索了教与学的关系问题。于是我“变‘讲堂’为‘学堂’”这个通俗的口号，作为上述改

革的总概括，也作为我语文教改的总主张。在80年代，我扛着“变‘讲堂’为‘学堂’”的旗帜，先后应邀赴新疆（前后两次）、四川、山东、黑龙江、广西、北京、山西、内蒙、江西、河南、广东等省市讲学，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热情鼓励。

四

80年代下半叶，一度闹得很红火的中语界逐渐沉寂下来。人们发现，旧的语文教学体系虽然受到了教改浪潮的冲击，但语文教学面貌并没有根本改观。许多有识之士开始“反思”了。在这个背景下，1987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确定的中心议题是：“总结几年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经验，找出存在的问题，探求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、途径和方法，进一步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”。在这次年会上，许多代表发表了很好的意见，而我当时的认识还不高，只是发言说，语文教改是“在夹缝中挣扎，在荆棘中前进”，强调的是教改的阻力太大，没有涉及教改本身存在的问题。

广州会议之后，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出现了一个相对停滞同时也是苦苦探索的时期。我发现，“变‘讲堂’为‘学堂’”之后，我的课有的教得比较成功，有的就教得不如人意。凡成功者，大都是语言因素抓得好，凡不成功者，一般是语言因素没抓好。我对新时期的语文教改作了认真回顾和深刻反思，我认识到，新时期的语文教改成绩巨大不容抹煞，但主要解决的是一个教与学的关系问题（这也是各学科的共性问题），对语文教学本身还触及不深。有关语文教学的一些重大问题，如语文教学的性质、目的、任务是什么，语文课究竟应该怎么教等问题，还没有真正解决。我还对传统语文教学作了思考，认为传统语文教学重感受、重积累的经验值得继承。还考察了儿童（指学前儿童）学习语言效率高的原因：一是他们在生活中学习语言，学用结合；二是他们走了一条捷径：感受，领悟，积累，运用。为此，我重新学习

了叶老有关“语感”的一些精辟论述。这样，思想才开始通畅起来。

1989年下半年，有人主张语文德育系列化，语文教材应按德育系列编选。针对这种主张，我写了《在“渗透”上下功夫——浅论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》一文，肯定了进行思想教育（不是政治思想教育）是语文教学固有的任务，但强调指出，“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，有自身的特定的内容，不能跟着政治中心转，不能简单地为政治中心服务”，还指出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要“渗透于语文训练之中”。我带着这篇文章参加了1991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中语会第五次年会。大会发言时，我鲜明地提出，语文要姓语，要坚持按语文教育规律办事，不能摇摆。

1992年12月，武汉市中语会召开第七届年会。在会上，我作了《是“学习语言”，还是“研究语言”——浅论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误区》的发言。我指出，“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个长期性、全局性的失误”，这就是“以指导学生研究语言取代组织和指导学生_{学习}语言，以对语言材料（包括内容和形式）的详尽剖析取代学生对语言材料的感悟和积累”，“而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，应该是组织和指导学生_{学习}语言，而不应该是让学生研究语言”，明确提出了“学习语言”的命题。表达了“加强语感教学，采取‘感受——领悟——积累——运用’的途径，为建构一个民族化、科学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而努力”的愿望。这个发言，可以说是我几年来的思想结晶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震动。《中学语文》主编邹贤敏教授感到了这篇发言的分量，他把我的发言稿打印了数十份，带到北京送给有关领导和专家审阅，接着在《中学语文》杂志上正式发表该文，并组织了一场“是学习语言，还是研究语言”的讨论。一些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积极参与了讨论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。《中学语文》还与湖北省教科所、武汉市中语会联合举办了一次座谈会。与会者认为，这篇文章切中时弊，“牵住了语文教改的牛鼻子”。

《是学习语言，还是研究语言》发表之后，我清醒地认识到，该文虽然亮出了“学习语言”这一基本观点，但还需进一步

完善这一理论，并将之付诸实践。在武汉市洪山区教委和《中学语文》杂志的大力支持下，洪山区“感受——领悟——积累——运用，加强语感教学，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”语文教改实验应运而生。根据实验教师的创造性实践，我又先后撰写了《语感类别及其训练》、《语感分析的特点及操作技法》、《试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》、《试论语文教学观念中的若干误区》、《构建“学习语言”语文教学新体系》（与陈伯安合写）等文。进一步揭示了语文教学观念和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，把“语感”引到教学实践中来。把“语感”分为“分寸感”、“和谐感”、“情味感”三大类别，总结出了一套通俗简明的语感分析的操作技法；感谢洪山区的实验老师，他们以自己的心血与我一道共同构建了一个“学习语言”语文教学新体系的框架。

“变‘研究语言’为‘学习语言’”与“变‘讲堂’为‘学堂’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即在“学堂”中学语言。“变‘讲堂’为‘学堂’”实现了课堂教学的结构改革，解决了教与学的矛盾；“变‘研究语言’为‘学习语言’”则实现了语文教学的本体改革，解决教（学）什么，怎么教（学）的问题。前者带有各学科共性，后者体现本学科个性。

1996年12月，武汉市教研室、《中学语文》、洪山区教委、江岸区教委、武汉市中语会、《学语文》、武汉六中等七单位联合举办“洪镇涛语文教学思想及教学艺术研讨会”。这次大会既是对我20年来语文教改历程的评估，也对我40年来教坛生涯的总结，更是对我60年来人生道路的回顾，我感到无限欣慰。感谢许多知名语文教育专家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、贺信。全国中语会副会长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张定远先生，专程从北京赶来祝贺并作专题发言。他说，“镇涛先生提出了一整套学习语言的体系、方法和途径”，“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完整、最系统、最富创造性的有关学习语言的理论、途径和方法的论述。”他指出，“镇涛先生为构建我国民族化、科学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而努力的主张和创见，是在语文教学本体上进行的一次深刻变革。”“如果这一变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，语文教学‘少、慢、差、费’的